

试论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戴鸿义

黄宗羲(1610—1695年)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启蒙学者,他使“讲堂痼疾,为之一变”,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近代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学校应成为舆论和监督机关

明清时期的学校,从京师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州县学,都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官僚场所。黄宗羲则认为开设学校不只是达到“养士”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使学校成为“治天下之具”,起到“清议”机关的政治作用。

中央太学的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应当推举当世大儒或退休宰相担任,其社会地位要与宰相同等。每月初一,祭酒南面讲学一次,皇帝亦应率领宰相、六卿、谏议等到太学听讲,其地位同一般的弟子一样。“政有缺失,祭酒直言不讳。”^①地方府州县学的学官,不可由政府选派,而应由地方“公议”,聘请著名学者担任,不论他们出身尊卑,不拘是否任过官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学官讲学两次,府州县官亦应同一般弟子一样听讲。“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②

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关,而且也是主持公是公非的政治机关,是加强舆论的社会力量。他从“天子

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企图通过加强学校的舆论作用,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③地方官有学校的舆论监督,对其苛政亦当有所收敛。

明政府为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对学校也采取极端专制的政策。对国子监的监生进行严格的管理,稍犯错误则科罚,情节较重即发遣安置,或罚充吏役。洪武十五年(1382),又颁禁例于全国学校,镌刻卧碑,不遵者以违制论。其中有一条规定:“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④农工商各界均可向政府提出建议,惟不准学生有发言权。用这种规定来籍制学生的思想活动,不许他们过问政治,籍以培养为专制主义服务的驯服工具。

黄宗羲同明朝这种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背道而驰,竭力倡导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他说:“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⑤

学校的士子有权干预地方政治,如果地方官无真才实学,或妄自尊驾老儒之上,学生可以群起攻之,直至将其赶下台。这种思想主张具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

黄宗羲所主张倡办的学校,具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议会制度的性质。让内阁定期向议会(学校)报告工作,祭酒(校长)向政府的负责人提出质问,并有权批准国家

政策法规等重大事项。但是，他所理想的学校还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组成的政治集团，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参政的机会。他认为君主及其左右在学校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下，不再恣意妄为，政治就清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绅权政治、贤人政治的幻想。列宁指出：早期启蒙思想家都“热烈地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⑧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同样具备这一特点。尽管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是值得称赞的。

二、批判抄撮之学的科举制度

黄宗羲认为封建社会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埋没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教育考试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开设进士科直到清朝末年，这项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也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起来。这种通过八股文取士的办法，要求考生做文章在内容上，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在体裁上只能按刻板的格式限制，不准越雷池一步，实际只是经书的摘抄。结果使有真才实学的人隐逸山林，而一批不学无术之徒却高踞功名之列。

清廷为笼络文人，延揽统治人才，标榜“崇儒重道，……求贤有文之意。”^⑦康熙十七年（1678），特设“博学鸿词”科，次年诏修明史。具有抗清爱国思想的黄宗羲，冒着“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的罪名，誓死拒绝清廷的笼络，一直坚持在书院讲学的教育阵地上。坚持“身遭国变，期于速朽”的爱国主义思想。

黄宗羲倡导大兴学校而鞭挞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是富贵熏心，互相鬻争的势利场，“有才能学术者”往往隐居于“草野之间”，^⑧毫无本领的人却乘机竞相角逐，这与学校无任何关系。因此，他“愤科举之学

牺人生平，思所以变之。”^⑨

在他看来，古时候吸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途径很多，只要有贤能的人，就很容易被基层推选上去，而今只有科举一途，既使象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一类的“豪杰人士”，也可能得不到进取的机会，这就是“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⑩因此，黄宗羲主张“宽取士之法”。除科举之法外，还应有荐举、太学、任子、郡邑佐、辟召、绝学、上书等多种途径，这就开拓了知识分子参与和议论政治的机会，国家采用更多有才能的人的实践活动，来改革社会，以实现“为万民非为一姓”的理想。

三、提倡“学贵践履”的治学风气

黄宗羲治学严谨，注重实践，不尚空谈。他自幼聪明好学，喜欢读书，“不琐守章句。除饱览家藏的文史典籍外，曾借阅会稽钮石溪世学楼、山阴祁承燦澹生堂、鄞县范钦天一阁的藏书。“虽年逾八十，著书不辍”。经、史、佛、老、天文、历算等领域，多所涉猎。“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⑪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前人决不盲目崇拜，既使圣贤豪杰也不怀任何迷信心理，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他推崇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但对王守仁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不赞同。他以自己的观点解释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说：“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倡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⑫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用实践改革现实。

黄宗羲认为“理”只是“气”所固有的“条理”，“气”是物质的，得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的论断。^⑬进而认为

“气”在“日新不已”，而因“理”也随之不断变化，这是客观变化所固有的规则。这种观点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象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却是行字，很有点象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工夫。……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⑭

黄宗羲受业于刘宗周，参加“复社”，五十岁时重创“证人书院”，从事讲学著书活动。他一生斥责魏忠贤阉党集团及其余孽，组织“世忠”，出走四明山，在浙东坚持抗清斗争多年。他说：“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名捕者一，守围城一，以谋反告奸者二三，绝气沙埚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辑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⑮黄宗羲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艰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革命实践家。

黄宗羲虽师承当时在学术思想领域上占统治地位的“王学”，但他不赞同王守仁“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更反对“王学”的“知行合一”实质上是把认识和实践混为一谈。他批判王学“如坐云雾”的高谈阔论的同时，即是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迈进了一步。

黄宗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倡导讲学要有宗旨。他说：“讲学而无宗旨，既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⑯学习过程也同教学过程一样，如果得不到要领，即使读书万卷，也事倍功半，就象张骞初到大夏，但却得不到月氏的要领。

第二，给学生指明研究学问的正确途径。黄宗羲反对“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游谈”的不良风气，^⑰他要求学生“不为迂儒之学”，必须先读《诗》、《书》、《礼》、《易》、

《春秋》和《左传》，研究透彻，同时认真钻研明十三朝实录及二十一史，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不断地认识社会和服务于社会。

第三，发扬“学贵践履”的良好学风。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学之道，但只有自己在实际中用得着的才是真正的学问。强调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反对那些倚门傍户，依样画葫芦的人，他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本领。

第四，教学态度认真，诲人不倦。听他主讲的人杳至纷来，“大江南北，从者駢集，守令亦或与会。”他的弟子多达一百多人，如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学家，全祖望、梁启超等大学问家也都接受了黄宗羲的影响，发扬黄宗羲的治学精神。

四、教育思想是时代的反映

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处于“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相辉映，没有批判的武器就不会有武器的批判，革命的急风暴雨造就了一代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黄宗羲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浙江余姚，这里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地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成长，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力量。在斗争实践中，他同这些新生的政治势力结成联合战线，在思想上对清初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教育等方面“满怀着强烈的仇视。”^⑱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受时代的和阶级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们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⑲黄宗羲的教育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的思想光芒却震动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了

（下转第92页）

得到的要多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能毫无顾忌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真正的认识。如果他们不懂，也会直接向其他同学提问，而他们对教师说明情况时就要考虑一番。

9、如果学生在学习时不感到威胁，就能学得更好

有几种情况会使学生感受到威胁：怕阅读理解考试不及格；怕达不到教师的过高要求而受到教师的批评等。无论学生由于哪些原因感受到威胁，都会造成一种“似学非学”的状态。如果学生只把一半的心思用于学习阅读，那么他们的学习效果也只会是不受威胁情况下所学效果的一半。

一些专家已经考虑过使教学减少威胁的方法。他们建议：教师应做一名提供方便条件的人。把一系列学习活动安排好之后，教师应退到一旁观察，由学生自己从事学习。如教师要求学生在阅读期间完成某项任务，或做“看一眼——抬起头”的练习，安排好之后，让学生们自己去做。这样学习变得轻松了，从而把学生从干扰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当教师必须和学生一起活动时，斯迪维

（上接第70页）一代新人。顾炎武见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⑩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说：“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受这部书（按指《明夷待访录》）的影响最早而最深。”^⑪又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按指《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⑫孙中山受到黄宗羲的影响也很深，他以黄宗羲的光辉思想动员人们和教育人们投身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教育史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

克建议教师应当采取不要武断裁决的态度以减轻威胁。不采取裁决性态度包括使用亲切的，使人容易接受的，实事求是的语言。也包括不采取称赞学生的作法、“（非常好）”或批评学生的作法“（又犯了相同的错误了吧？）”。不断的称赞也会威胁学生，因为学生感到必须达到教师对他们的过高要求；批评会使学生认为他们没有犯错误的权力。采取非裁决性态度也包括注意语气和非言语动作。怎样说一句话与说什么话一样重要。如果教师对学生采取非裁决性态度，学生就不怕教师，学习阅读的效果就会更好。

结论：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教阅读课的九点设想。我认为根据这些设想进行教学比不进行这些设想而盲目教学取得的效果更好。我也提供了一些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例子。这些例子阐明了怎样通过对学习的估价来教授阅读。因为无论估价还是例子都不是绝对的，所以教师可以利用这些估价也可以探讨新的估价方法。

译自美国《英语教学论坛》

1985年7月号

注：①②③⑤⑧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④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

⑥⑩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一卷。

⑦《康熙谕旨》。

⑨⑪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文集》卷十一。

⑫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⑬《黄宗羲列传》《清史稿》卷四百八十。

⑭⑮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卷五十。

⑯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⑱黄宗羲：《怪说》。

⑲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

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二》。

㉑顾炎武：《顾宁人书》。

㉒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